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有感）

池永成

八年抗战史，	难忘敌凶残。
三光灭人性，	妇女成“慰安”。
南京大屠杀，	重庆狂轰案。
同胞遭惨害，	赤血染河山。
回首当年事，	历历在眼前。
民族频复灭，	谁来挽狂澜。
人心向着党，	众目仰延安。
国共重合作，	力量始空前。
坚持持久战，	诱敌陷深渊。
四五，八。一五，	举国浸狂欢。
胜利来不易，	英烈逾万千。
中日今友善，	同遭侵略篇。
时过五十载，	军国魂未散。
为育后来人，	前车当借鉴。
百年近代史，	中华屡遭犯。
因何受凌辱，	腐败是根源。
人民新中国，	一扫旧狼烟。
世界仍动荡，	霸权正横蛮。
周边不宁静，	常年有争端。
身居盛世境，	勿忘敌情观。

綦江抗日潮

——綦江抗日救亡运动纪实

邓后炎

一、学生带回新信息

三十年代初的綦江，贫困落后。四川军阀刘湘为了围剿川北红军，残酷地抓丁派款，搜刮民财。当时是民国二十二、三年，收税收到了民国七、八十年。綦江地处川黔边境，土匪多如牛毛，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善良百姓时时处于惊恐之中。当时我在上海念书，1934年曾回过一趟綦江，看到天干无收，很多农民无法生活，成群结队，外出乞讨。回上海时，我从东溪到綦江，一路上看到遍地是骨瘦如柴的饥民，婴儿啼哭，老人呻吟，景象十分凄惨。我在沱湾住旅店，由于怕土匪抢劫，只得躲在院子边一间堆柴草的屋里。旅店门前围着七、八个饥民，向住店客人讨要吃食。那时，綦江到重庆只有石板小路，我第二天从綦江起身，走了三十几里就碰上土匪抢人，幸亏躲得快，没有被抢。我绕道才到了重庆，然后坐船到上海。1936年10月，我与夏经权一起奔丧又回东溪，看到形势与两年多以前大不一样了。首先是公路通了，1935年修通了川黔公路，1936年又修通了川湘公路，原来重庆到綦江要走三天多，这次我们十多人挤坐在一辆吉普车里，只用了大半天时间便从重庆到了綦江。仅管才

修好的路坑坑洼洼，车子走时十分颠簸，但不到一天时间就从重庆到了綦江，省却许多路途之苦，当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由于通了公路，綦江、东溪比原来繁荣多了。新修了一些房屋，新开了一些店铺，街道比原来整齐，市面比原来兴旺，一些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綦江从完全封闭落后开始慢慢开放。由于有了公路，外面的新信息很快传到綦江，綦江的年青人也向往外面的大世界。三十年代初綦江外出念书的很少，1935年后外出念书的越来越多，单是东溪场上就出去了七、八个。当时，全国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七君子”在上海被捕，轰动全国。我们回家后，亲朋们都来询问抗日的消息。我1935年即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后改为“教联”）思想上早受到抗日救亡的教育，于是趁机向亲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劝说亲朋们有了机会要积极为抗日救亡出力。到了1936年底，东溪场上外出读书的都回来了，有夏经权、陈希龄、陈光炜等。故旧重逢，很是高兴，大家相互摆谈着在外面的观感，摆谈着各地的抗日救亡形势，使我们的亲朋大开眼界，精神振奋。他们说：过去如在昏昏睡中，听了外面抗日救亡消息很受教育，都是中华子孙，一定不能让外国侵略者霸占中国。

外地学生带回的新信息使綦江空气清新，为綦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打下基础。

二、观摩会宣传抗日

刘湘围剿川北红军失败后，国民党中央开始把势力慢慢向四川渗透。1936年，蒋介石派出参谋团进驻重庆，收买各

地方首脑，扶植亲蒋力量；建立特务机构，控制刘湘及其手下的活动。蒋介石的作法，引起刘湘不满，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守住自己的地盘，刘湘放松了对共产党的镇压，开始拉拢一些反蒋力量对付蒋介石的控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答应了和共产党团结抗日，四川受压迫的各方面进步人士开始重新活跃，而一些地方官吏也借机把一些知名的进步人士拉到自己身边，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当时任綦江县长的黎师韩，是刘湘属下川军系统的旧式官僚，为了争夺对綦江的完全控制，与蒋介石特务机关有一定矛盾，同时也有一定的爱国思想。黎师韩听说从外面回东溪一些读书的学生，有知识，思想也很活跃，同时这些学生的家庭多是地方上知名的绅士，于是来拉拢。1937年元旦，黎师韩亲自出面，组织了綦江全县中小学教育成绩“元旦观摩会”。当时綦江县只有一所中学，即綦江中学，地址在现在的中山路小学，另外有八、九所小学，包括綦江城关小学、女子小学。“元旦观摩会”上，各学校把学生的国文、算术、图画作业、手工品刺绣拿出展览，还举行学生作文、演讲、体操、球类比赛。黎师韩特别派人到东溪，请我、夏经权、陈希龄、陈光炜等人到县城参加元旦观摩会，担任裁判员。我和夏经权趁机在观摩会上提出：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民族危亡，大家都应宣传抗日，观摩会上演讲比赛、作文比赛必须是抗日救亡的内容，人们都同意。结果，演讲比赛会上，中小學生一个个慷慨激昂地控诉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作文比赛写的内容也是与抗日有关的。由于当时县城不大，又很少举行这类观摩活动，城里不少人都来参观，受了一次抗日救亡的教育。观摩

会在我们主持下成了抗日宣传会。

1937年上半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向社会各界宣传修通川黔、川湘、滇黔公路的成绩，组织了一个“京滇公路周览团”。周览团路过綦江，由于周览团里有一些思想进步的知名人士，其中有我的老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徐泽林。徐教授对文史很有研究，他要我为他收集古迹和文史材料。我们举办了欢迎大会，在会上徐教授和周览团中其它进步人士介绍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新消息。

三、成立了抗日剧社

元旦观摩会结束后，綦江县长为了拉拢东溪大户夏、罗、陈三家与在外读书的青年学生，便来找我，要我到县政府第三科（第三科分管教育，科长罗映江也是一个正直、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旧知识份子）当督学。因为黎师韩知道，我与东溪夏、罗、陈三家都有关系，并且和外出读书的年青人联系密切。我考虑到当了督学后更有利于宣传抗日救亡，便答应了。黎县长呈文上报省政府批复同意后，我走马上任，当上了县政府督学，成了政府官员。

1937年7月7日，北京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震惊。消息传到綦江，爱国的热血青年义愤填膺，刚好暑假来到，外出读书的学生纷纷回到綦江县城、东溪等地度暑假。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个个都非常气愤，自发地组织起来，宣传抗日。东溪一些青年成立了体育社和图书馆。图书馆设在东溪下场口夏伙飞家后花园，夏家拿出了一些书，大家又把带回来的抗日书刊聚到一起，共同阅读。图书馆还经常讨论如何宣传抗日救亡的事。本来，东溪陈家和

夏家有矛盾，但是抗日救亡把陈家和夏家的年青人团结在一起。这时候，在成都四川大学读书的陈毅乔回来了，陈毅乔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便参加了地下党，回到东溪后积极参与了图书馆和体育社的活动，趁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还组织成立了文化剧团、歌咏组、壁报组。我在县城听到了东溪年青人成立团体宣传抗日的事，也多次赶到东溪，支持青年们抗日宣传活动，还提供了很多歌唱、演出的材料。就这样，东溪的抗日救亡宣传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赶场天，青年们走上街头，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节目，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使东溪群众深受感动。很快，到了1937年底，有一次，我邀请东溪文化剧社到县城演出，在露天坝搭起戏台，演出抗日小话剧、歌舞。我把县长黎师韩，第三科罗科长都拉去看剧。虽然道具简陋，但演员演得很有感情，群众闻讯都踊跃来看，戏台前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演出结束时，演员又领着群众高呼抗日口号，声震綦城，影响很大。

1938年初，我和陈毅乔及东溪进步青年商量，把东溪文化剧社带到县城，再组织县城一些进步青年参加，成立“九一八剧社”，以进一步打开綦江抗日救亡局面，陈毅乔和文化剧社的人都同意。于是，綦江“九一八剧社”很快成立起来了，成员有陈光熙、陈光炜、代积馨、黄圣洁、夏淑勤、周德光，还有县政府第三科科员张秀夫。“九一八剧社”不单演小话剧，还排演了一些大幕剧。如《飞将军》、《凤凰城》、《春风秋雨》、《明月》等。县长黎师韩很支持剧社的活动，有一次，排练的一个节目中有一个汉奸，被抓住了，要被审问。需要一个年纪大点的演员演汉奸，可是剧社都是年青人，我们正在发愁，黎县长知道了，告诉我他愿意

演那个汉奸，我们见县长愿意登台演出，很受感动，表演得更加卖力，结果，黎师韩把汉奸演得非常好，看演出的人很多，演出获得了成功。1938年夏天，“九一八剧社”还组织了一次远足南川的公演，同时在川湘公路沿线的三溪、石角、蒲河、万盛等场镇也进行了演出，演出过程中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受群众欢迎。每到一处演出，观众如潮，掌声不断，十分热烈。南川过去比较封闭落后，群众看了演出，受到了抗日救亡教育，懂得很多抗日救亡道理。

东溪“文化剧社”和后来的“九一八剧社”，对推动綦江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抗战师资讲习会

綦江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綦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刚担任督学时，全县中小学只有十来所。我知道，要把抗日救亡推向深入，必须进一步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那就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我每到一个地方检查学校，都积极作那个地方的行政官员、知名绅士、广大群众的工作，希望大家出钱出力办学校，我动员一些地方拿出公庙、祠堂的产业办学。在我的鼓励下，同时也在抗日救亡运动的促进下，很多地方都办起了学校。然而，办学校要教师，学校办多了，教师不够用，需要加快师资培训。1937年暑假，我带了一批教师到重庆四川师范培训。但由于学校发展得快，到了1938年，到县里要教师的乡镇更多，教师短缺现象更加严重，县里决定利用暑假举办师资讲习会。我抓住这个时机，把师资讲习会办成了抗日宣传的大学校。师资讲习会由县长黎师韩任会长，主管教育的县政府第三科罗映江科长任副会

长，我任教务主任，实际上负责了师资讲习会聘请教师、招取学员、安排上课全部工作。我知道陈毅乔川大已经毕业，夏经权在万县办报纸受排斥，退职在家，于是提前写信聘请他们到师资讲习会担任教师。师资讲习会地点选在文庙，即解放后綦江县委所在地，学员一部分从在职的小学教师中选，一部分从社会上具有中学文化的青年中招，一共两百人，其中女学员占百分之二十。师资讲习会时间是六个周，安排了教育理论、中日关系、时事政治、音乐、军事训练等课程。陈毅乔是学教育的，负责讲教育理论，夏经权讲中日关系，我讲时事政治，时事政治还包括国民政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音乐课是从重庆请来的老师上，军事训练是从驻军请教官上课。当时綦江驻军有一个团，团长谢应麟，是一个爱国军官，他家在沦陷区，对日寇的横暴有切肤之痛，很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师资讲习会”仿照陕北公学上大课的方法，二百名学员编了两个中队，每个星期有三个下午活动，内容是讨论、出墙报、搞歌咏、上街游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当时正是保卫大武汉时期，抗战形势很紧张，师资讲习会每周至少一次上街游行。其余时间就上大课听报告，上课的教师准备都很充分，讲起来有声有色。

“抗战师资讲习会”学员毕业时，除布置教书任务外，还明确布置各个学员都要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把抗日救亡的道理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所以，“抗战师资讲习会”实际上被我们办成了抗日救亡宣传员的培训班。大大地推动了綦江抗日救亡运动。

五、綦江抗日潮

1938年下半年、綦江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

抗战师资讲习会结束后，陈毅乔、夏经权都留在了綦江，陈毅乔担任了綦江中学女生部主任，夏经权担任綦江中学男生部主任。当时，綦江中学校长叫田慕寒，是国民党CC派份子，他活动当綦江中学校长时，我在县里担任督学，就向田慕寒提出条件，他要聘我介绍的老师到綦中校任教，我就支持他当綦江中学校长，田慕寒同意了。后来，田慕寒当上綦中校长，我便推荐陈毅乔、夏经权到綦中任教，田慕寒果然下了聘书。陈毅乔是地下党员，经她介绍，夏经权首先入了党，紧接着，我和县政府第三科科长、进步青年张秀夫也入了党，成立了中共綦江县特支。夏经权任书记，陈毅乔任组织委员，从重庆转来地下党组织关系的危昭文任宣传委员，1939年危昭文调走后，我继任了宣传委员。

綦江中学原来有一个地下党员，名字叫薛子正，曾经组织綦江中学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后来薛子正调走了，但綦江中学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热情很高。陈毅乔和夏经权去后，通过课堂教学、课后谈心等形式，向学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形势教育。并暗中培养、发展共产党员，把那里具有政治觉悟和爱国思想，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学生吸收到共产党组织里边，先后建立起中共綦中校男生支部、女生支部，那时危昭文在古南小学教书，发展建立了中共古南小学支部。各个学校都以地下党支部为核心，团结群众，发展绝大多数师生，运用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办墙报、发传单、演话剧、向抗日官兵写慰问信、募寒衣款和义卖劳作制品集资

捐献给抗日官兵等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下半年，綦江中学还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在夏经权、陈毅乔两同志的领导下，以中共党员学生为骨干，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有时候还到乡下宣传，曾经到过北渡乡、三会乡等地。当时教唱的抗日救亡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演出的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前夜》等；同时还在城墙、岩壁和房前屋侧用石灰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团结起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大幅标语。夏经权、陈毅乔两位老师还组织带领綦江中学二百多名学生，步行到东溪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綦中学生在东溪镇上教唱救亡歌曲，办墙报，贴标语、漫画，呼口号，还演出小歌剧、话剧，演讲抗日救亡道理，场面极为热烈，对激发东溪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起了一定作用。

1938年冬，中共綦江县特支发动綦中校师生，开展了一次轰动全城의募寒衣活动。以党员学生为骨干，组织大多数学生参加，分成若干小队，深入到各机关、团体、街头巷尾、茶房酒店，一面宣传抗日，一面进行募捐，到年底止，募集了寒衣款法币七千多元。同时发动学生利用劳作课时间制作花筒、笔筒、手杖、洞箫、竹笛等手工艺品，实行义卖，卖给机关、团体、知名人士和工商业者，收入法币四千多元。以上两项共收入一万一千多元，全部寄给抗日前线官兵，作购制寒衣之用。

1938年下半年，重庆转关系到綦江的中共党员张昌德到

中峰中心校任教，通过抗日宣传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抗日宣传队，在中峰和大垭场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窃国大盗袁世凯》、《打倒东洋》等节目，场周围数十里的农民都赶来观看，受到了鼓动和教育。

在这一段时间，我还利用督学到各地学校检查的机会，集合师生讲话，宣传抗日道理，发动各个地方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宣传抗日。

总之，1938年綦江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全县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六、逆流

1938年，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率领川军出川抗日，不久便病死了。刘湘一死，蒋介石抓紧了对四川的控制，原刘湘留下的各地方长官纷纷被撤换。1939年初，綦江县县长黎师韩被解职，换成了李光宇。李光宇原来是清华大学教授，忠厚正直，上任后成天忙于政务。县党部书记长孙巨涵被换成巴县人刘砚一，他是CC派。这时，綦江抗日救亡运动还没受到大的冲击。1939年，国民党五次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制定了秘密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不过蒋介石不敢公开砍倒抗日旗帜。1939年上学期，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綦江中学搬到永新张家沟，由于地处偏僻，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受到很大限制。接着，传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的消息，我们听后非常气愤，准备开声讨大会声讨，可是国民党县党部不同意，他们说还要想办法挽救汪精卫，公开声讨不好。其实，这时国民党已经明显地向右转，当然不愿意公开声讨汪精卫。

李光宇就任綦江县长后，他对抗日救亡运动也较同情，他的夫人也很热心抗日宣传。这时候，国民党提出精神总动员，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政治第一，一切集中。”即所有力量都集中到国民党一党、蒋介石一人身上。这些口号很明显比较反动。但我们在宣传时，巧妙地把“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换上革命的内容。有一次，我同李光宇夫人到东溪宣传“精神总动员”，我在群众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讲：国难当头，要维护国家利益，一切力量都要集中到抗战上来，一切服从抗战需要，绝不容许象汪精卫那样当汉奸。李光宇夫人见我未讲服从“蒋委员长领导”，就补充说“军事第一、政治第一就是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因为李光宇夫人还是提到了抗战，我没有反驳她，但也看得出国民党处处强调突出“蒋委员长”。

新上台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砚一相当反动，疯狂压制抗日救亡活动，暗中侦察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和进步力量抢地盘，争夺青少年。县里要成立妇女会。本来，热心妇女工作的积极份子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地下党团结的进步青年，象夏淑勤、霍伯鱼、郑晓炎。我们积极工作，各方面联络人，进行宣传，并几次召开筹备会，可是国民党县党部百般刁难，对我们提出的妇女会组成人选指责挑剔，又到处拉选票。没有办法，我们就退了出来。后来妇女会虽然在县党部控制下成立起来，但每次开会到的人稀稀拉拉，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刘砚一还派人暗中跟踪进步青年，派人到綦江中学压制进步青年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上半年，我们还在县城召开了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驻军一个姓董的旅长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团结抗日。我

们也在会上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压制越来越厉害，我们再也没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了。

1938年5月，国民党驻军十六补训处进驻綦江。十六补训处政治部主任叫申炳勋，人的个子不高，但思想非常反动，行动鬼鬼祟祟。他到綦江不久就找我去训话，问我参加了什么党派。我说抗战救国，哪里还讲什么党派。他说我平时宣传，经常讲国共合作，就是有共产党的味道。我争辩说全民抗战，举国上下各党各派都要团结一致，讲国共团结有什么不对。他横蛮地说：什么团结不团结，要突出地讲“蒋委员长领导。”我知道跟他说不清道理，不再理他。他又指责我平常喊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口号不对。我问他为什么不对。他说：“拥护蒋委员长不应讲条件，要无条件服从，只能喊‘服从蒋委员长抗战建国’的口号”。充分暴露了他那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反共”的本来面目。后来，我见到县长李光宇，谈到申炳勋找我去谈话，指责我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不对，只能呼“服从蒋委员长”。李光宇听后很吃惊，接着冷冷一笑说：“这些事情难得说，不过抗战还是要抗的。”明显表露出对申炳勋的气愤。这说明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孤立，就连他们委任的县长也不赞成他们的作法。接着，夏经权、陈毅乔也被申炳勋传训。申炳勋和刘砚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将綦江县城火火红红的抗日救亡运动压了下去。

七、转移东溪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镇压綦江县城和綦江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地下党团结领导的爱国进步人士被迫转移阵地。

1939年上半年，经过中共綦江县委慎重研究，决定在东溪创建一所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中学，把一批进步青年转移到那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作通了东溪进步实业家吴举宜的工作，由他出面发动东溪、赶水各界人士，筹款创建东溪中学。由于陈毅乔、夏经权都是东溪人，我在东溪的朋友也很多，吴举宜筹款也很出力，大家齐心合作，共同努力，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到五月份，已筹募了近三万洋钱，东溪有名的陈、夏、吴三家都出了钱，吴举宜出得最多，陈光炜次之，夏经芳把电厂拿出来了，夏奠言也有捐助，我则奔走于报案、送批、找教师等工作。校董会是在东溪书院召开的，大家推出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代理院长张翼鹏作名誉董事长，吴举宜任董事长，夏奠言也是校董事之一，学校设在孤儿院，聘我任校长，吴举宜和夏奠言是对立的，我刚好作了缓冲人。

1939年暑期，我、陈毅乔、夏经权都向原工作单位提出辞职。这时，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认为李光宇太老实忠厚，承担不了“积极反共”的任务，綦江县长又换了人，黄埔学生李白英就任綦江县长，他是军人出身，忠实于蒋介石。他来后，想叫原来第三科长罗映江作秘书，我任第三科科长。可是党组织决定我到东溪中学任校长，于是坚决提出辞职，离开县政府到了东溪中学。

1939年下期，东溪中学正式开学了。招生广告贴出，报名学生蜂拥而至。有的县外、省外的青年也来报名，很快招满两个班，一百人。教师有夏经权、陈毅乔，从复旦来的刘乃庚，从陕北来的沈薇、张一萍等，生理课教官是军事参议院的医官担任的。教师多数是地下党员，学校仿陕北公学教

学方法，废除灌输式，提倡启发式教学，重视课外活动。课外与课堂结合，学生成绩提高很快。东溪中学校歌是利用陕北青妇会会歌改编的，歌词有：“战，战，战，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是溪中学生……。”东溪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战时后方服务团”，以师生中地下党员为骨干，团结了大多数进步师生。学校办有《黎明》、《曙光》、《街头巷尾》三个墙报，每半月出刊一期，各个班也自办有墙报，不定期出刊。这些墙报的内容，有抗日消息报导、评论文章、诗歌、散文、漫画、歌曲等，主要是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激励了人民抗日斗志。有时还通过举行文学、演讲、歌咏比赛来宣传抗日。学校的歌咏队和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和赶场天，分别到东溪场上教唱抗日歌曲，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940年元旦期间，学校在镇上组织了几次抗日宣传晚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代用品》等话剧，观众场场人满，我和陈毅乔等亲自参加演出，轰动一时。学校还发动学生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开始每人写三封，后来一般学生写十多封，最多的达七十封，鼓励前方抗日将士英勇杀敌。1939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妇女委员会提倡开展“新生活运动”，东溪的一些机关团体、中小学教师都参加“新生活晚会”，一月一次。我们利用“新生活晚会”宣传抗战形势。东溪中学还发动学生组织募捐队，向东溪镇各机关、团体、工商业者和地方人士募捐，将募得的款项寄去前线购制寒衣，支援抗日官兵。

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东溪中学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极大地激励了东溪各界人民的抗日热忱。

八、反查封的斗争

1939年冬，噩耗不断传来，搬到永新的綦江中学进步师生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镇压，一些进步学生被传讯，受监视，还有一些被无理默退。接着，顽固派向东溪中学发起攻击。新任县长李白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砚一等人公开出面，大肆诬蔑共产党，扬言要对东溪中学的进步师生施行镇压，风雨满楼，岌岌不可终日。我们请示了重庆上级党组织，回答叫我们团结各界人士，坚持不懈，顶住风浪。因此我们在1940年春季仍然照常上课，还招了春季两个班，一百人。开学后不久，李白英、刘砚一亲自出马到东溪，先向东溪中学董事长吴举宜出示教育厅指令，内称“据密报，该县私立东溪中学自校长邓后炎以下皆有异党嫌疑，批示该校无案可稽，显系蒙混办学，仰即查明办理”。李白英、刘砚一又多次找我去谈话。记得第一次谈话时，他们开口就说：“你们办学校作反动宣传，定要严厉查办”。并点名夏经权、陈毅乔有异党嫌疑，叫我检举他们。我据理反驳，指出陈、夏两位教师宣传抗日没有错。谈话无结果，我走了。后来，他们又找我去谈，说：“你不检举其他人的异党活动，你也有嫌疑，我们就查封学校。”我叫他们拿出证据，找出证人来，他们无言以对。还有一次，李白英带着人到东溪中学清查异党。我和一些学生在校门口拦住他们辩论。李白英说不过我，满肚子火气无法发泄，顺手抽了站在他身旁的勤务兵几拐棍。东溪稽查处特务分子刘济平也积极配合顽固派，暗地跟踪进步师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国民党顽固派决定查封学校，消息传开，东溪各界人士群

起声援。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反动措施。全校师生闻讯后更是怒不可遏，叫骂不已。李白英来向我下最后通牒：“你不交出异党分子，我就不客气啰！”我们坚决反对。他只得悻悻而去。驻在东溪的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代理院长，东溪中学名誉董事长张翼鹏非常同情、爱护学校进步师生，坚持反对查封学校，他打电话给四川省主席张群，为学校极力申辩。学校董事长吴举宜也到县里活动，申辩挽救学校。历时一月之久，形势仍不见好转，于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让陈毅乔、夏经权两位教师转移。他们走后，我和其它进步师生仍顶住风浪，坚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守住这块抗日救亡运动阵地。到五月下旬，形势越来越恶化，学校几经挽救无效，最后我也只得辞职它去。校长一职由吴举宜董事长兼任，接着学校老师也先后撤离，学校被查封。

九、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开展

东溪中学被查封后，綦江抗日救亡运动仍在继续开展。蒲河闸坝工人，中共石角支部书记罗恩源在石角、蒲河的大街墙壁上编写张贴名为《大家看》的墙报，先后出刊二十期，大量揭露日寇侵华罪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效果很好。1940年春，从武昌迁来綦江的国民党“战干团”所属“忠诚剧团”在綦江广大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抗日节目，教唱抗日歌曲，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后来，国民党顽固派残酷镇压“战干团”里进步青年，杀害二百多人，酿成闻名全国的“綦江惨案”。1940年上半年，日本飞机两次轰炸綦江，炸死炸伤四百余人。綦江城关的进步青年抓住这一机会印发传单，书写标语，揭露日寇侵华罪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中共南方